

2001/32

華中師範學院

中國古典文學

函授教材

第二冊



714.1
4452
2
- 2 -

華中師院中國古典文學函授教材第二冊目錄

第三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情況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人詩歌

- 第一節 建安詩人
- 第二節 正始詩人
- 第三節 太康詩人
- 第四節 東晉詩人
- 第五節 陶淵明
- 第六節 南北朝詩人

魏晉南北朝文人詩歌選讀

- 一、曹操：(1)薤露歌(2)蒿里行(3)苦寒行
- 二、曹丕：(1)雜詩(2)燕歌行(3)箜篌行
- 三、曹植：(1)名都篇(2)美女篇(3)白馬篇(4)野田黃雀行(5)送應氏詩二首(6)贈贈白馬王彪并序(7)七哀詩
- 四、阮瑀：駕出北郭門行
- 五、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 六、王粲：七哀
- 七、阮籍：詠懷五首
- 八、嵇康：答二郭三首
- 九、張載：七哀詩
- 十、潘岳：悼亡詩二首
- 十一、左思：詠史四首
- 十二、劉琨：(1)重贈盧諶(2)扶風歌
- 十三、郭璞：游仙詩二首
- 十四、陶淵明：(1)歸田園居三首(2)移居二首(3)西田穫早稻(4)飲酒三首(5)讀山海經(6)詠荊軻(7)桃花源詩并記
- 十五、謝靈運：(1)登池上樓(2)游赤石進帆海(3)登江中孤嶼(4)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 十六、鮑照：(1)采麥歌(2)東武吟(3)放歌行(4)出自薊北門行(5)行路難(6)梅花落(7)詠史(8)擬古
- 十七、謝朓：(1)同謝諮議登銅爵台(2)遊東田(3)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4)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十八、沈約：(1)別范安成詩(2)宿東園

十九、庾信：擬詠懷三首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散文和小說

一、范曄的生平及其後漢書

二、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

三、酈道元和水經注

四、楊銜之和洛陽伽藍記

五、顏之推和顏氏家訓

六、干寶和搜神記

七、劉義慶和世說新語

魏晉南北朝散文和小說選讀

一、後漢書范滂傳

二、三國志隆中對

三、水經注：(1)新崩灘(2)黃牛灘(3)西陵峽

四、洛陽伽藍記法雲寺

五、搜神記：(1)李寄(2)干將莫邪

六、世說新語：(1)荀巨伯(2)管寧(3)郝超(4)新亭(5)溫嶠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

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選讀

(1)子夜歌四首(2)華山畿四首(3)隴頭歌辭三首(4)李波小妹歌(5)木蘭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

一、曹丕的典論論文

二、劉勰的生平及其文心雕龍

三、鍾嶸和詩品

第四編 隋唐五代文學

第一章 唐代的詩歌

第一節 唐詩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隋及初唐的詩

第三節 盛唐詩人(上)王孟高岑及其他詩人

第四節 盛唐詩人(中)李白

第五節 盛唐詩人(下)杜甫

第六節 白居易及其他中唐詩人

第七节 晚唐詩人

唐代詩歌选讀（篇目散見于文学史中，数量較多，不另列目錄。）

第二章 唐代的散文

- 一、古文运动的兴起
- 二、韓愈与古文运动
- 三、柳宗元的散文思想与艺术

唐代散文选讀

- 一、韓愈：（1）張中丞傳后敘（2）原毀
- 二、柳宗元：（1）蝘蝓潭記（2）小石潭記（3）捕蛇者說（4）童区寄傳

第三章 唐代的傳奇小說与变文

- 第一节 唐代的傳奇小說
- 第二节 唐代的变

傳奇小說选讀

- 一、白行簡：李娃傳
- 二、李朝威：柳毅傳

第四章 唐五代的詞

- 第一节 詞的形成
- 第二节 晚唐五代詞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發展大势
- 第三节 晚唐詞人
- 第四节 五代十国詞人
- 第五节 李煜

第三編 魏晉南北朝文学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的社会情况和文学面貌

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的廢立,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五九八年)的滅陳,四百多年中,都屬擾亂分裂的局面。中間雖然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滅吳,到惠帝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二十四年之中,中國一統,然為時很短,不能說是太平的局面。以朝代來分別呢,那末其中有魏蜀吳三國的六十年(這是從魏文帝受禪到晉武帝滅吳計算,凡六十年,如果從初平元年算起,則有九十年。)西晉統一的二十四年,東晉偏安的一百〇三年,五胡雜糅的僭竊和晉對峙的百三十六年(從惠帝永興元年劉淵據離石稱漢至北魏滅北涼凡百三十六年)而南北朝的划分,南朝之宋五十八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北朝之魏統一九十年四年(這自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元年至孝武帝拓跋修永熙二年計算,凡九十四年,如果自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算起,則一百八十四年)其後為西魏二十二年,東魏十六年,又為北齊二十八年,北周十四年,到隋文帝代周,其後又滅陳,而南北才歸于統一。

這種分裂的局面,其最初是始于東漢中葉以後社會階級矛盾的尖銳,就是說,作為生產手段的主要因素的土地,一般已為貴族豪門所占有,至于失了土地的農民歸宿無非飢餓死亡和被迫起來反抗,于是有黃巾起義,終于使東漢滅亡。自三國後,這種矛盾,並沒有得到緩和,象在曹魏,政府直接占有的荒地很多,軍隊的屯田和政府佃給農民的土地雖然占相當比例,但由於戰爭對生產嚴重的破壞和戰爭的繼續,農民始終是站在飢餓綫上的。西晉至于南北朝,也是在不觸動貴族豪門的大地主所有權的範圍內,使農民土著于鄉村,重新和土地結合,借以鞏固封建社會的經基礎。象西晉的占田,把國家屯田化為官吏私田,它的辦法是:「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其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晉書食貨志)農民雖然也分得了土地,但貴族大地主和農民之間有着很大的懸隔。至于東晉,其流亡大地主集團是大量占有土地,使廣大農民很少有甚至沒有土地可耕種,而又大多數兼營商業,造成商業資本的發展。南朝的統治期內,南方始終成為名門豪族霸占土地的樂土。北朝的均田制,雖然把無主荒地給與貧民,雖然在「無令入有余力,地有遺利」的目的下,收得了些安定農民的效果,然而由於均田制的精神在于維護豪強地主的利益,收效也就有限得很。因此,農民迫于飢餓,迫于死亡,起義者接二連三,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跡。

貴族豪門不但占有土地,同時也壟斷政治。我們知道,自從陳羣于延康元年(二二〇年)議請建立九品官人之法以後,鞏固了他們壟斷政治的法律保障,于是貴族豪門兼攝要職,世襲高位,而寒素士人少有出路甚至全無出路,所謂「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反映了這種政治上的矛盾。

伴隨政治經濟上的壟斷,貴族豪門進而也壟斷了學術文化。他們有累代的上層家庭教育,有充裕的生活閑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環境,這一切都構成了他們有獨特的享有和承繼文化傳

統的特權，都不是一個出身寒素的人的環境所可比擬的。

在這種階級矛盾尖銳之下，一方面是招致了農民起義，對貴族豪門的反抗；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的加深，變亂相循，歲無寧日。而就西晉來說，由於統治階級的內部衝突，招致了外族的入侵，「五胡亂華」和南北朝長期對立，加深了人民的災難和痛苦。

在這內禍外患接踵而來的日子裡，戰爭飢疫，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离散了多少人的家庭，在那四百年中，人口的銳減和人民遷徙的情形，是使人不寒而慄的。史載桓帝永壽三年（一五七年）中國的戶口計戶一千万，口五千六百餘萬。隋文帝代周，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餘萬，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自桓帝永壽三年至是年，經過四百多年，而戶不到漢的二分之一，口不到漢的五分之一，其間人口死亡之多是可以想見的。不但一般的人們死亡有这样的多，而在大亂相繼和篡奪相繼的局面下，文人也動輒得咎，死于非命的也很多，如孔融、禰衡、楊脩、何晏、嵇康、張華、潘岳、石崇、陸機、陸云、劉琨、郭璞、盧諶、謝靈運、范曄、鮑照、王融、謝朓、鄭道元、溫子昇等等，或為統治者所殺戮，或死于亂軍之中，都是令知識分子寒心的事。

由於階級和民族矛盾的尖銳，由於戰亂相繼和人命的危險，無論統治階級、知識分子或一般人們的思想意識，當然要起着很大的變化，於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就由支配地位而變為次要了；另一方面為了穩定現實的局勢，或為了醫治那受了創傷的心灵，就有釀成新信仰新宗教的要求，而老莊玄學、道佛宗教都乘機而起。

儒學變為次要，除了人們對於傳統的道德，舊日的信仰起了動搖以外，當然還有它的原因，那就是曹操出身濁流，起初本不為一般名士所歸附，他為了摧抑名門士族的反對勢力，來巩固自己的新政權，於是他的用人標準，改變過去以通經為入仕的條件而為唯才是舉的辦法，樹立一種法治精神，以摧抑士族的勢力。而人們對於儒學信仰的動搖除入仕條件變更之外，則因為儒家到了東漢已非孔子的真面目，而成了一種迷信的哲學。這種迷信的哲學，在政治力量沒有崩潰以前，它是會不動搖的，因為那種哲學是漢代統治階級的護身符，極為漢代統治者所愛好所擁護，一等到東漢的政治勢力動搖，它自然要跟着動搖起來。再就是儒學到了東漢已成為破碎的經學，正如漢書儒林傳贊里所說的「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在班固的時候，其破碎已如此，以後更可想而知，象這種破碎的經學，怎樣不使人懷疑呢？

老莊哲學原系代表沒落封建貴族的一種意識形態。自東漢中葉以後，經過長期的農民戰爭和軍閥混戰，轉入到三國的分裂，許多地主貴族，對自己的地位悲觀失望，因而代表沒落貴族的道家思想，在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上，復獲得其發展的条件，而形成其支配的地位，並以此去麻痹人民。何晏王弼蔚成研究老莊思想的風氣，這由於他們對現實煩悶失望，不敢面對現實，而想逃避現實，只從冥冥的空想去尋求精神的安慰，借空談去消磨其有閑的歲月，因而捲起清談之風。

道教是民間的迷信宗教，不過在表面上雖然穿了一件迷信的外衣，實質上，却是鬥爭的，是羣眾階級鬥爭的組織。東漢末年，道教在社會動搖，階級矛盾最尖銳，人民生活的痛苦的情勢下，在民間宣傳推廣；張陵的「五斗米道」，張角的「太平道」應運而生，十幾年間，徒眾到了幾十萬，造成歷史上有名的黃巾起義。這種道教不但在民間發展，對於當日的知識分子也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讀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的便是那在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人生短促的思想與感情，曹植這樣，阮籍這樣，陶淵明也是這樣。時光飄忽，人生短促，就是感到死的悲哀，而希望生命的延長，針對着解決延長生命的要求是道教，所以道教興於漢末，實在有它的客觀上的必然原因。從開始起，服食（求生命有限的延長）神仙（求生命無限的延長）就和道教結

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佛学在东汉明帝时已入中国，至曹魏初年，渐和老庄的玄学相互而行。它在因果报的神道說教上，为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行使精神統治的無上武器，因为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受着自然力相当支配的农民最易为那种迷信宣傳所迷惑。其次，佛教在印度形成后，由于中国和印度之不断在商业交通的联系上，在西北各落后民族中已傳布了种子。其小乘教义，对于那受自然力支配更大的落后民族，在他們的意識中，也最易發生影响。其次，在背离现实，高深而玄虛的大乘佛学的哲理上，較道学为一种「玄之又玄」的形态，对于有閑的貴族地主为一种最符合他們的精神娱乐品，尤其在政治上感觉苦悶，無出路的他們，便最易接受那种蹈空的「出世」思想。

总之当时的学朮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鼎立。儒家学說从西漢以來即占着主導地位，到东汉末叶，旧地主階級秩序尚未完全动摇，所以仍保持着它的势力。但自入三国后，地主階級秩序在各种矛盾中，不复如以前的穩定，地主統治階級对自身的統治前途失望，中間階層对现实感觉苦悶，这样，道、佛兩家思想就漸漸兴盛起來。在这一長时期的諸階段中，儒、道、佛三种思想各有其起伏交替，但从总体看來，則是道、佛占优势，儒家占次要地位。

这种社会情况反映在文学方面，統治階級文学内容上表现为悲涼、遁世、遊仙、縱酒，形式上則趋向于享乐的个人主义的華麗駢偶的文体，而在作者行为上則是清談、厭世、放誕、享乐。但人民文学却反映着真实的痛苦生活、反映着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保持着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优秀傳統，如乐府和民謠。在文学的兩条战綫上，人民文学数量虽少，却是最有价值的。貴族文人的作品，只有接近人民和充分吸取人民文学滋养的，才放着光輝，如曹氏父子尤其是曹植直承兩漢乐府的精神，王粲、稽康、阮籍、潘岳、左思、刘琨、郭璞、陶潛、謝灵运、鮑照等一方面采取民間的形式，一方面内容上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民間疾苦、中間階層的苦悶。

因此，我国文学进展到魏晋南北朝，無論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新的成就和复雜的变化。这成就和变化是空前的，同时对后世文学也有極大的影响的是下面几点：

第一、五言詩的突起。这是受乐府影响而产生的詩体，本期最發达，且不乏偉大作家，如曹植、陶潛是本期代表詩人。

第二、乐府的新發展。它繼承漢乐府的現實主义精神，产生了新形式，表現着南北民族的特点和南北民族文化的混合，如吳声歌、西曲歌、鼓角橫吹曲等。

第三、小說的發达。中国小說，到三国时代才正式發达起來。在漢代，文学接受过去的神話傳說的遺產，产生了一些尚未成形的小說。到了三国以后的小說，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都有进展。这时期的小說，大致可分为兩大类：一类是志怪小說，如搜神記，搜神后記，幽明錄、續齊諧記等。一类是逸事小說，如世說新語。其影响后世，开了唐宋傳奇小說的源头。

第四、寫景文学的建立。如酈道元的水經注，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等，这种雜記体以描寫風景为主的散文，不但在描寫技巧上开辟了新的境界，在内容上也表现了热爱祖国的感情。唐以后如柳宗元等都繼承了这个优良傳統。

第五、文学批評的發展。东汉以前文学和学朮是不分的。固無所謂文学批評，至王充始建立了一些文学批評的原則。后漢曹魏以來，一方面因为文学觀念漸漸明朗而独立起來，一方面因为評論人物的風气盛行，由人物評論衡量到文学方面的成就，便導致了文学批評的發展，單篇的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机的文賦，系統的專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之类，它們有力地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評的基礎。

第六、声律的講求。詩文上講求声韵格律，到南朝时期达到极点。例如詩，漢时只重韵脚，

不講平仄；西晉陸機漸知平仄的重要；到齊梁時代，沈約、王融創「四聲八病」之說，沈約作「四聲譜」傳播于文學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不但支配着詩作，開了唐代律詩絕句的先聲，連散文和賦也都受到影響。散文方面顯著的是「駢文」盛行，這種文体，既講對偶，尤重聲律，以後轉為唐朝的四六體。賦的方面，由漢賦變成「俳賦」，用典更多，聲調更美，如鮑照的蕪城賦，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哀江南賦，是當時名作。一般史傳論文也陷入這氛圍里，如范曄後漢書就沾沾以修辭自喜，而論文如文心雕龍却全用駢體寫成。講求四聲格律，對文學形式上雖增了一層束縛，但在聲韻上卻是一個進步。唐詩宋詞的發展，後代音韻的研究，不能不說是直接受其推動作用。

以上是魏晉南北朝文學新面貌的輪廓，每一點都具有歷史的意義。我們不能不佩服先代人民創造力的偉大。這樣嶄新的面貌的出現，自然有各種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勞動人民在極度困苦的情況之下從事生產，養活了那些文人，更創造了有生命的文學並給文人以營養；其次，民族混戰的結果，客觀上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時佛經翻譯也給中國文學以影響；更其次是各種文學作品之間的交互聯系，交互影響，交互作用，交互提高。這樣，新文体、新技巧、新內容的作品就相繼產生並發展了。但是應當指明，所有的美的形式只是在豐富的內容上才表現其價值，那些統治階級腐朽墮落的作品，無論如何作字句的推敲，它終究是黯淡無光的。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的文人詩歌

第一節 建安詩人

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詩的傳統里，是一个很突出、很燦爛的时代。推其所以突出、燦爛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时代的乱离，人民的痛苦，使作者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当前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也由于統治階級的提倡，文心雕龍时序篇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茂英俊，故下筆云蒸。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歸命于河北，偉長从宦于青士，公干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筆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談笑」。統治者的好尚如此，上行下效，于是便造成了建安文学的极盛时代。我們現在分別論述它的特征和重要作家。

一、建安文学的特征

(一) 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經从辭賦轉变为五言詩。五言詩的产生，远在西漢时代；五言詩的發展，而且开辟了一个五言詩的时代还是在建安之世。鍾嶸詩品說：

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可知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經从辭賦轉变为五言詩，而作家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作家提倡向乐府学习，所謂「依前曲，作新声，（曹植鞞舞詩序語）所以他們作乐府很多，而且他們作乐府的風气，凡旧傳漢曲的四言或雜言的，到这时多以五言代替它。如善哉行，古辭「來日大難」篇四言，曹操的「自惜身薄祜」，曹丕的「朝游高台觀」篇都是五言；薤露，古辭「薤上露，何易晞」篇雜言，曹操的「惟漢二十世」則為五言；蒿里，古辭「蒿里誰家地」篇雜言，曹操的「關東有義士」篇則為五言。这样大胆的運用五言詩的形式以模仿乐府，反映現實，而又从乐府中吸取了丰富营养，把民間文学集中提高，于是便开辟了五言詩的时代，成为兩漢文学轉入魏晉文学的歷史標誌。

(二) 这时的文学已由鑒戒的轉变为抒情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說明了建安文学不同于兩漢作家「王、楊、枚、馬」所代表的以歌功頌德为目的，以諷諭鑒戒為幌子的文学，而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抒發性的文学。也不同于班固「詠史」那样「質本無文」，而是情文兼具，文質相称的文学。我們从兩漢辭賦的發展看來，建安以前辭賦的內容以頌揚鑒戒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頌揚鑒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詩的發展看來，漢乐府民歌本以敘事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敘事而抒情化，兩者都表明抒發性是建安文学的特色。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序」說王粲「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說應瑒「流离世故，頗有飄薄之嘆」，說陳琳「述喪亂事多」，說曹植「有憂生之嗟」。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劉楨「情高以會采」，「詩品」說曹操「頗有悲涼之句」，又說「王粲發愀愴之辭」，从這些說明都可以看出建安詩的抒發性。

关于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时序篇」于歷敘曹氏父子和建安諸子后，又总括地说：「观其诗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气也。」慷慨之音就是建安诗歌抒發性的具体表现。当时文人飽經流离，生活的感触多，这种感触便是慷慨之音的由来。他们一般都有恐懼生命易尽，急于乘时立业，追求不朽之名的思想。如陈琳诗云：「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时，鐘鼎何所銘」（「遊覽」二首之一）和曹操的「壯心不已」、曹植的「慷慨不羣」正相类似。这种感情和亂离的感情都是建安诗歌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也是建安诗歌抒發性的共同表现，这种内容和表现不但反映了社会的喪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这样的慷慨悲歌永远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后人所謂「梗概多气」或「建安風骨」便是指这一种力量。

（三）繼承漢樂府詩中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通俗化的色彩。就魏晉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說来，其作品的内容和精神，多年是离开实际的社会人生的，但在建安时代的诗歌中，有大部分作品还能保存乐府詩中那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一方面因为漢乐民歌本是直接描寫人民生活的，象「孤儿行」、「战城南」、「十五从軍征」一类的乐府便是建安社会詩的淵源，就是說，乐府詩的现实主义精神給予了建安作者以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建安作者們身經亂离，遭受或目击許多苦难，正視了当前血淋淋的现实，不但在詩歌思想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具体地描寫了社会生活，貫注着丰富的感情，我們在他們的作品里發現不少記敘时事，同情疾苦描寫亂离的詩。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寫出漢末政治的紊亂和战禍的慘酷。王粲的「七哀詩」也描寫出当时的亂离景象，曹丕六言詩「白骨縱橫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也是寫乱后情形，曹植的「泰山梁甫行」也寫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至于蔡琰的悲憤詩，記親身的經歷，更是慘痛。又如陈琳「飲馬長城窟行」，对人民徭役之苦，夫妇別离之情，寫得既非常真实，而又非常苦痛。这些例子表明作家們或半生戎馬，或歷經憂患，实际生活的接触广大，感受得多，體驗得深，所以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很强，这精神当然也是直接从漢乐府承受来的。

建安诗歌不仅承受着漢乐府这种精神，也繼承了漢乐府的語言的通俗形式。黃季剛先生詩品义疏論建安五言詩說：「文采繽紛，而不离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称物則不尚雕鏤，敘情則惟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詞，振其美响。」「不离閭里歌謠之質」正說明建安诗歌是民歌化的，民歌化便包含着語言的通俗这一特征。將一般建安詩和兩漢正統文学——賦頌和四言詩比較起来，通俗化的色彩是很明顯的。尽管比起最初的五言詩如班固「詠史」之类来，建安作品顯得文采化，比起朴質的民歌来，又不免「雅詞化」，但基本上还是明白自然的語言，不曾失掉「乐府性」。这一点在当时「詞采華茂」的曹植詩里也还是很顯著的。

二、建安诗歌的重要作家

建安时代活躍的作家，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三曹」是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

曹操（公元一五五年——二二〇年）字孟德，沛国譙人，他的父親曹嵩是宦官曹騰的养子。他二十歲举孝廉，以后討董卓，滅袁術袁紹等，統一了華北，成为北方的实际的統治者。在他統治的区域里，發展生产，任用人才，使多年极度混乱的社会安定下来，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貢獻。他在文学方面的貢獻，是提倡乐府文学，用乐府的旧調旧題寫新内容，因而他的詩不仅保存了乐府的通俗面貌，而且繼承了乐府的现实精神，「薤露行」和「蒿里行」原来都是挽歌，而他拿来寫时事，「薤露行」寫何进誤国和董卓殃民，其敘董卓焚燒洛陽，居民被驅入关的情形說：「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寫羣雄互爭，使兵災延續，其敘当时的兵禍的慘狀說：「鎧甲生蠹蝨，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

念之断人腸。」不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丧乱时代，也流露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

他的「苦寒行」、「却东西門行」、「龜虽寿」、「短歌行」都是抒情成分較多的詩。「苦寒行」寫行軍征伐的痛苦。这是他在建安十一年（公元二〇六年）征高干时所作的。其开首說：「北行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为之摧。」寫山路中行役的艰苦，是非常深刻的。接着說：「樹木何蕭瑟，北風声正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寫景物的荒寒寂寞，反襯出了行役的辛苦。后面說：「行行日已远，人馬同时飢，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沒有和士卒同艰苦的生活体验，是寫不出这样生动的語句。「却东西門行」是寫征夫怀鄉恋土的感情。它描繪了「戎馬不解鞍，鎧甲不离傍」的战乱生活，也流露了「狐死归首丘，故鄉安可忘」的思鄉情緒。龜虽寿中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寫年老而壯志不为之衰減，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是很可貴的。世說新語「豪爽篇」載王敦酒后輒吟咏「老驥伏櫪」四句，用如意敲唾壺来打拍子，壺口都敲缺了，可想見其积极乐观，故能令人精神奋發的作用。「短歌行」开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四句，表現在这个丧乱时代人人容易感到的「人生無常」的苦悶，而想借酒解憂。但他的思想不是消极頹廢的，只要体味末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便知道作者的积极的感情。这四句虽然流露了擴大政权的英雄本色，但基本上是关心人民的。

曹操又被称为長于四言詩的作家，因为自詩經以后，四言詩就很少动人的作品，但曹操的四言实有几篇佳作，除上面所举的「龜虽寿」、「短歌行」外，如「观滄海」云：

东臨碣石，以观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丰茂，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这詩「日月之行」四句，想象是很丰富的，語句是很警策的。而且气魄偉大，是描寫自然景观前所未有的名篇。

曹操的詩是以气勝的，前人所謂「其詩豪迈縱橫，籠罩一世」（胡应麟「詩藪」）所謂「雄沈俊爽，时露霸氣。」（沈德潛「古詩源評」）大約就在这里，因为他的才略的雄大，足以高其气，他的势位的崇高，足以吐其气；他的生活的变动——治軍三十年，足跡所到，南臨長江，东到海上，西上散关，北登白狼，經歷丧乱又多——足以充其气。「观滄海」、「龜虽寿」中的「老驥伏櫪」四句以及他篇章，都足以說明他的詩的气概的偉大，这种气概是和他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或对丰功偉业的追求，緊密結合着的。

总之，曹操「借乐府以寫时事」（沈德潛語）描繪出乱离的痛苦，这是直接承受漢乐府现实主义的精神，而形式上擺脫古典的束縛，从民間文学吸取营养，使語言更通俗，也表現出了民歌化的特征。

繼曹操而致力于乐府歌辞且有新貢獻的为曹丕，（公元一八七——二二六年）丕字子桓，操的長子。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一年曹操自进为魏王，次年，立丕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操卒，丕繼立为魏王，旋受漢禪，即帝位，改元黄初，他缺乏曹操那样的雄才大略，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現，不过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魏志）而生活实践又相当丰富（見他的典論「自敘」），所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較高的。他的「典論」一書現存三篇，其中「論文」一篇，对文人的臧否，文章的得失以及提倡文学，鼓励著述，都有精辟的議論，开六朝文学批評的先河。他的燕歌行兩篇，真正創立了純粹七言的詩体，今举一首为例：

秋風蕭瑟天气涼，草木搖落歸為霜。羣燕辭歸鵲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

他方？賤妾嬋娟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兩漢樂府或古詩尚沒有純粹的七言，「柏梁」聯句，既是偽作；張衡「四愁」，尚非全体，到曹丕的這首詩，純粹的七言詩才真正成立，在中國詩史上，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實。這詩寫婦人對行役久而不歸的丈夫的殷切懷念，通過這種殷切懷念，令人想見時代的喪亂，不知道离散多少人的家庭，通過這種的殷切懷念，也可以想見婦人那種哀怨愁思的景況，和寂寞可憐的生活。至于詩的音調的諧婉，節奏的美妙，是和詩中人物的心情體態配合得很緊密的。沈德潛說：「和柔巽順之意，讀之油然相感，節奏之妙，不可思議」。又說：「句句用韻，掩抑徘徊，『短歌微吟不能長』，恰似自言其詩」。（古詩源評）這批評是恰當的。

他的樂府「善哉行」（上山采薇）是「悲行役」的詩，寫客遊的感情非常深刻，末了本是寫客遊好象行舟的隨波流轉，却反以行舟好象客遊，這樣的運思造句，是很靈活巧妙的。不過「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墮入了當時「人生無常」共同的苦悶中了。然而它是有現實性的。

他的徒詩「西北有浮雲」：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借浮雲寄託客遊的感慨，有濃厚的家鄉之思，這正是社會戰亂的反映。

就上面所舉的例子看來，在內容上，或取材于行役，或歌詠思婦的感情，都繼承了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在形式上，他的詩有雜言，有五言，有七言。其雜言中還有「大牆上蒿行」約八十句，近四百字。句子短的三字，長的十三字，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這都可以說明他的詩是多样性的。在風格上，沈德潛雖說「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然並不失着建安共同風格的所謂「慷慨」，不過比不上曹操那種「雄沈俊爽」罷了。他的語言，大都明白自然，近乎口語，和漢樂府民歌的語言幾乎沒有分別。詩品說他的詩，「百餘篇率皆鄙質如俚語」，就是說他的語言是通俗化的，是語言的民歌化的。

在建安詩壇上能領袖羣倫而無愧色的，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給五言詩奠定基礎的，自然是曹植（公元一九二——二三二年）。他字子建，最初封平原侯，最後封陳王，死後諡曰思，故世稱陳思王。他自幼在古典文學方面就打下了基礎，「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魏志）他也愛好民間文學，能背誦俳優小說數千言」（魏志注引魏略）。他的文學創作生活開始得很早，他自己曾說：「少小好為文章」（與楊德祖書）。曹操曾見到他的文章，對他說：「你倩人做的嗎」？他答說：「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這应当面試，為什麼倩人呢」？那時銅雀台新成功，曹操帶着諸子登台，使他們做賦，他援筆立成。這篇賦雖然並不怎樣偉觀，但年未及冠（他是時十九歲）而能援筆立成，自屬難能可貴。所以世說新語說：「世目為綉虎」，謝靈運說：「天下才一石，子建獨得八斗」，這雖不免有些夸大，然亦可想見其才情了。

這樣，自然得到他父親的歡心，而想要立他做太子，但後來終竟失了寵。魏志陳思王傳：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几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飾，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朮，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植任性而行的，如擅開司馬門，最傷了他父親的心。這樣，為太子之議終于不曾實現，却因此引起曹丕對他的猜忌。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王位，便打擊曹植，起初是殺掉一向擁護曹植的丁儀和丁廙，遣曹植就國，并派人嚴密監視他。黃初二年，貶他的爵位為安鄉侯。從此，曹植便時常感到身命的危險。曹丕雖死，明帝即位，曹植仍然是被猜忌的。他屢向明帝求「自試」，但是不

敢用他，而且对他生活的限制越來越多。他「常汲汲無歡」，四十一歲就死了。

所以曹植的詩可分為前後兩期，而前後兩期的界綫，即曹丕即位元年（公元二二〇年）。在曹丕即位以前，他的生活比較自由舒適，因此，他的一部分作品，真如敖陶孫詩評所說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如「公譙」、「斗鷄」、「侍太子座」等篇，不過是所謂「憐風月，狎池苑」的詩，是他在鄴城度過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鄴下詩人集團生活的留影。

在此期中，曹植的生活雖是貴公子的生活，所作的詩，雖也多半是安逸生活的留影，但是可注意的，他是「生于亂，長于軍」的，自然要接觸戰爭的荒難和人民的疾苦。他「送應氏詩二首」之一云：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傾墜，荊棘上參天。不見耆舊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寫出了戰禍的慘酷，這樣強調戰爭的破壞性，就為時代的災難留下深刻的影象。

又如「贈丁儀」：

……朝云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

憫農愛士的情感，表現得非常真摯。這些詩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同情疾苦的人道主義。

他也有不用亂離疾苦做題材，而從另一面反映社會的詩，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斗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驅未及半，雙兔过我前，攬弓捷名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鸞。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瞻鯉鰈胎鰕，炮鼈炙熊蹯。鳴鳶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击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這詩暴露都市貴遊子弟的驕逸生活。寫這班少年將時間消磨于飲食遊宴，天天如此。雖然有騎射的妙術，只用在打獵，全無憂國之心。這種諷刺，是極富有現實性的。

從上所引的詩目和詩篇，大致可以看出作者前期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曹植後期的詩是他的憂苦悲憤生活培育出來的。因此充滿了「哀怨」的情調，特別感人。原來，曹植在政治上受壓迫，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為什麼他的「哀怨」的作品會得到讀者的同情呢？我想這是容易理解的。曹植雖然是上層統治階級的一員，但當他在政治上失敗以後，就完全失去自由，表面上雖然仍是藩王，實際上是處處受到監視。因此，他在生活上的感受就和人民有了一定的聯繫，他的詩歌也就能反映出一定的人民性。例如他的「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這是一篇悼友之作。他眼看到和他親近的人，受到曹丕的迫害，自恨無力救助，只好託之以諷諭。以「風波」喻險惡，「利劍」喻權力，「雀」喻被難的朋友。少年是假想的有力來救援的人。這樣的諷諭，就充滿了抗抵暴力維護自由的精神，也與廣大人民在暴力統治下希望得到解救的要求是相通的。

他的名作「贈白馬王彪」七章是交織着哀傷、憤慨和恐懼之情的長詩，這詩作于黃初四年。在這一年的五月，他和任城王曹彰、白馬王彪一同入朝，曹彪到洛陽後不明不白地死了。曹植和曹彰在七月初回封地，希望同路东歸，但監國使者不給他這個自由。這詩第三章：「鴟梟鳴衡轡，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四句痛罵監國使者的橫暴和播弄是非，最為憤激。第五章寫生離死別之感：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

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响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对着將离去的曹彪想到永逝的曹彰，从曹彰的結局想到自己的前途，悲懼交集，語極沈痛。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动我神，棄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鄰。恩爱苟不虧，在远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儿女仁？倉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这一首前面的話全是寬慰曹彪，囑他不要悲伤，末后忽然又說要想不悲伤是办不到的，都是真情实感自然动人的表現。

因为曹丕压迫他太厉害，他想感悟曹丕，而又不便明說，于是用妇人思念丈夫來比喻他思念曹丕，以求減輕压迫，这表现在七哀詩：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怨嘆有余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載，孤妾常独棲。君若清路塵，妾似濁水泥；浮沈各異勢，会合何时諧；願为西南風，長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以一代天才的曹植，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怎样叫他不愁思憤恨呢！象「君若清路塵，妾似濁水泥，浮沈各異勢，会合何时諧」。这几句讀起來是何等的沈痛。这里寫出了他的内心对統治者——曹丕的多少怨恨与不平啊！丁晏在「曹集詮評」里說：「此其望文帝悔悟乎？」又說：「結尤淒惋」，是恰当的評語。

曹丕死后，他的儿子曹叡繼位，如前所說的，曹植的生活上所受的限制甚至越來越多，而他在這時所感到的痛苦，最主要的是再三改封，居处不定，他在「迁都賦序」中說：「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适于东阿。号則六易，居实三迁。連遇瘁士，衣食不繼」。因無几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这表现在他的「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独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东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云間。自謂終天路，忽焉沈下淵。驚飈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謂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处，誰知吾苦艰？願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与根荄連。

这篇用轉蓬自喻，哀楚动人。其中說「宕宕当何依」、「流轉無恆处」，还不算是最苦痛的，更深的悲感是「長去本根逝」。原來曹叡不許諸王入朝，曹植苦于「婚媾不通，兄弟永絕。……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求通親親表）骨肉之間，生离等于死別，所以末四句寫得更沈痛。正如沈德潛所說的：「迁轉之痛，至愿归糜滅，情事有不忍言者矣」，（古詩源評）

更應該指出的，他在自己的痛苦中，並沒有忘記人民的灾难：

八方各異气，千里殊風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条，狐兔翔我宇。（泰山梁甫行）

反映出海边貧民生活的艰苦。这是因为他飽經喪乱，比較接近人民，又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压迫的，生活是艰辛的，自然产生对貧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这詩里和前面所举的「送应氏詩」一样，表現了他的人道主义。

他也沒有忘記祖國的召喚，如他的雜詩之五說：「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国憂。」雜詩之六說：「国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持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又白馬篇說：「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顧，何言子与妻？名挂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国难，視死忽如归」。都是愛国的慷慨之言。因为他在压迫之下，並不頹喪，不放棄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終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詩感情强烈，精神煥發，而这种热情和壯志就使他成为爱国者。

建安詩歌的風格是慷慨的，而曹植尤表現出這種特色，所以他自己說，「雅好慷慨」，上述這些苦悶而複雜的感情就構成他的詩里的慷慨情調。這慷慨不是消極感傷而是以積極向上的熱情壯志為主要內容。鍾嶸「詩品」評曹植的詩道：「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骨氣」就是指這個表現熱情壯志的慷慨。

「詩采華茂」說明曹植在詩的語言提煉上的成就。他的古典文學修養有助於提煉詩的語言，但他是在樂府民歌的基礎上來提煉的，不是走向漢賦的「深覆典雅」，而是發展樂府民歌的「清新流麗」。其成就正如黃季剛師所說的「文采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我們可以舉他的「美女篇」來說明：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覯？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這一篇被人認為建安「修詞之章」的代表，如拿來和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較，詞句更加精煉，但風調氣息還是很相近的。所不同的，「陌上桑」、「羽林郎」是敘事詩，「美女篇」卻該算作抒情詩。作者顯然不是以描寫美女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樂府本以敘事為主，建安文人的詩也敘事，但更多的是個人抒情，這在曹植尤為顯著。

曹植不但在樂府方面，發展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民歌化的色彩，而且他是奠定了五言詩的基礎、專以五言名家的詩人。根據朱緒曾「曹集考異」的統計，（零章斷句不算在內）他的樂府共四十三篇，其中五言的三十篇；古詩三十三篇，其中五言的二十六篇，共計七十六篇，其中五言五十六篇，几占全數的四分之三，可見曹植對五言詩最努力，故所作亦最多。

東漢人試作五言，有兩種途徑：或模仿樂府，敘述故事，描寫社會，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是；或用五言抒發自己的懷抱，如古詩十九首之類是。曹植創作五言，是偏重於第二種途徑——抒情的。不過古詩的作者雖已經將五言詩的地位提高，然沒有視為專業來做的，曹植同時文人，如曹操、曹丕、王粲、劉楨等，天才雖高，但對於五言的創作，都不如植曹的努力。曹植辛苦勞動，創作五言，作多方面的嘗試，其生活、思想、感情和個性，時代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都反映在五言詩里面，這樣，就擴大了五言的內容，豐富了五言的技巧。楚辭的體裁，出於楚國民間，有「志潔行芳」的屈原出，用這種體裁發抒他的愛國主義的思想與情感，楚辭的體裁才盛行。五言詩出於漢代民間的樂歌，有曹植出，用這種體裁，描寫社會的災難，描寫自己深廣的思想感情，樹立慷慨和民歌化的風格，五言詩體的基礎乃巩固。就中國文學史考察起來，每一種新文學體裁自民間產生以後，一定要經過多年的醞釀，多人的試作，至偉大的天才出，綜合前人的經驗，盡他的全力，多樣性地從事創作，擴大它的內容，增進它的技巧，用這種新體裁創造出許多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作品，樹立模範，開辟途徑，使後人根據已得的成就加以創造和提高，於是這種新體裁的基礎乃能巩固，乃能盛行，而這偉大作家便為後世奉為宗匠。曹植在五言詩即居這樣的地位。所以就擴大五言詩的基礎來說，後來的阮籍、陶潛的作品，或有超過曹植的地方，但後人評論五言詩的，仍然崇奉曹植為典型。鍾嶸論曹植詩說：「譬人倫之有周孔」（詩品）。在封建社會里，周孔為人倫的規範，在詩歌里，曹植是奠定五言詩體的主角，是專以五言名家的詩人，故他的作品亦為五言詩的規範。

建安詩人除「三曹」而外，當推「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瑒、劉楨。他們自孔融以外，大都依附曹氏父子，後園同遊，飲酒賦詩。然而他們竟還有一顆

● 善良的心；眼看着人民的苦难，不能無动于中。所以陈琳有「飲馬長城窟行」，阮瑀有「駕出郭北門行」，这都是繼承了漢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刘楨在当时的詩名最盛，曹丕称贊他說：「其五言詩妙絕時人」，（与吳質書）鍾嶸也称讚他說：「楨詩……仗气愛奇，勁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陈思以上，楨称独步。」（詩品）但就其現在的十五首詩看來，并不能使我們覺得他的作品真是「妙絕時人」，是「陈思以下，楨称独步。」在这些詩里，找不到「飲馬長城窟」一类的作品，或許他有更好的作品，早已散失了，也說不定。

七子中存詩最多，成就也最高的，当推王粲（公元一七七——二一七年）。他字仲宣，山陽高平（今河南修武）人。他的祖上是大官僚地主，但他从小就逃难，「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刘表」（魏志本傳）。这样，在道路上的奔走流离，就接近了人民羣众的生活，了解了时代的灾难。他的登樓賦深刻地反映了喪乱时代的思鄉感情。这种感情，不只是他个人的感情，而且是千万人民在乱离中归家不得的感情。这篇賦是抒情小賦精妙的作品，它和漢賦不同，漢賦只是鋪張排比的描寫，在所描寫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感情和个性；他这篇賦就不然，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但他反映战禍的慘酷与人民的灾难而描寫得最深刻、沉痛的是他的七哀詩，其一首云：

西京乱無象，豺虎方遘患。复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蛮。親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号泣声，揮涕獨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应伤心肝。

「出門無所見……不忍听此言」，用最簡單的几句话，描寫出最悽慘的一段事实，令人讀了，当时兵災慘酷，民不聊生的情形，可以想象得之。这是用最經濟的手腕，节取片断事实，代表整个社会的面貌。实后来杜甫「三吏」「三別」的淵源，是紀事詩最優秀的作品。

其第三首云：

边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迟（与治同）？登城望亭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与家辞。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來勿与諮。

这是寫边地荒寒，人民苦于战争。「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深刻地描寫出战士們在边城生活的痛苦，而这种生活描寫得如此深刻，正因作者是「昔吾親更之」，可見作品的具体内容和真实情感都是由生活實踐得來的。这詩和前一首不是同时之作，所以有「天下尽乐土」之句，但建安之世，飢饉、兵火、疾疫，几乎占据了整个的时代，天下那里有乐土呢？这亦不过是比較之辭罢了。

由上所述，可知王粲的作品和「三曹」一样，是繼承漢乐府现实主义的精神。尤其是「西京乱無象」一首接受了「十五从軍征」的創作方法，就是說，从一樁情事中來吸取題材，表現主題，使人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實質。它的語言的道路也是乐府民歌化，玩味上举兩首，就可見一斑了。至于他的詩的風格，那当然是建安文学的共同表現的慷慨，徐楨卿說：「仲宣流客，慷慨有怀」。（談藝錄）方东樹也說：「蒼涼悲慨，才力豪健」。（昭昧詹言）因为时代的喪乱与複雜的感情自然要構成他的詩里的慷慨情調了。

第二節 正始詩人

正始是魏廢帝的年号（二四〇——二四八）。当日虽由曹爽執政，然司馬氏已在陰謀夺取曹氏的政权。这和建安时代的政治情形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这种政治斗争的激流中，就地主階級說，一方面經過当时各封建体团的長期分立，長期的互相屠殺，他們仍無法穩定其階級地位，相

反的，社会經濟反表現一步一步的衰落；一方面当魏晉交替之际，知識分子有忠于旧主或轉事新主的危难。象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長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他們縱跡山林，作个隱士，或不問世事，潛心学朮，对现实社会不敢正視，企圖逃避，产生「遺世」「习玄」的風尚，是很自然的。宋人呂南公灌園集卷二謁真君殿詩說：「念昔魏晉間，士流罕身全。高人乐遺世，学者习虛玄。」指出了在这种斗争中，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态度的趋向。但是一个人生長在社会中，总是無法逃脫社会諸关系的牽制。虽然这些人想竭力做到「与人無愛亦無憎，」而实际上他們不能沒有愛憎，尽管他們「遺世」「习玄」，而有的人还不免要遭到屠殺。还有，統治階級內部官僚地主和莊園地主互相傾軋也是重要的一面。自魏屯田制度成立后，皇族壟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豪族地主占有制的矛盾，它們表示了朝野貴族地主階級的对立，形成政治上有权力的人物和社会經濟上有地位的人物的分化。这一分化，使得世家大族采取与現任官吏的不合作的态度，因此产生大批隱士，造成这时和以后希企隱逸的風气，就是說隱逸是世家大族的战略的撤退。在这撤退中，他們反对礼教，追求自由，行为放浪，崇尚虛玄，是表現了他們的反抗性的。而兩晉的玄学，也就在这时建立起來，使中国的文化思想从这时起了一个大大的轉变。倡導这种思想轉变的人物是王弼、何晏和竹林七賢，王何是七賢的先驅。晉書王衍傳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論以天地万物皆以無为本。」又儒林傳序說：「講明六艺，鄭王为集漢之終；演說老庄，王何为开晉之始。」魏晉春秋說：「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与之遊者，未尝見其喜慍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逃于山林，号为七賢。」竹林七賢和建安七子是不同的：七子的生活中心是宮廷，七賢的生活中心是山林；七子圍繞在君主貴族的左右，靠攏統治階級的，七賢是大部分人帶着反抗性的。其中虽有山濤、王戎从事政治，然而無損于他們隱逸山林追求自由的性格。而这种生活思想的轉变，也就是当日文学精神的轉变。老庄的玄学，由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人的倡導鼓吹，于是道家思想日益兴盛。因此，当时的文学，一方面表現了一些脫离现实的虛無道家言，一方面也表現了破坏礼教，追求自由的反抗现实、批判现实的积极性。不过他們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对于文学的表現方法，多半是由建安那种寫实的变为象征的，抒情的变为說理的。文心雕龍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詩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标焉。」（明詩）何晏現存詩二首，确是浮淺的。竹林七賢中的山濤、王戎、向秀、阮咸沒有詩流傳下來，刘伶除那著名的酒德頌外，只存留一篇北芒客舍的五言詩。能作为正始詩人的代表的，自然只有阮籍和嵇康了。

阮籍（二一〇——二六三）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他賦性傲慢，發言玄远，愛酒喜乐，反对礼法。晉書本傳說：「籍本有济世志，屬魏晉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飲为常。」可知他并不是無志之士，只因为那时司馬氏大权在握，积极的斗争，已不可能，只有消极的反抗，借酒醉臥不問世事了。司馬昭尝为司馬炎求他的女儿为妇，他大醉了六十天，無法和他通話作罢；鍾会几次向他提問時事，打算抓他的錯处办他的罪，也因为爛醉得免。这是他消极地避禍和跟統治者不合作的办法。但社会上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实在內心，跟着学起來他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徒然增加了沒意思的空談和喝酒，这种行动，就影响到当时的政治上，弄得許多人無力办事，只会談虛說玄，毫無补于实际，所謂「清談誤国，」就是这样來的。

其实阮籍那种消极的反抗，是有他积极的一面。他憎惡那些高官大吏假借礼法來陷害好人，所以他反对虛偽的礼法；他看到司馬氏陰謀篡夺和名士的变节，所以他發抒了許多隱晦的感傷；他受不了那种压迫、束縛的生活，所以他歌頌着超然物外的境界。这种种心情的結合，表現出來的是那有名的八十二首詠怀詩。在这八十二首中，吞吞吐吐的發抒了他的憤恨和情感，不过是用隱